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崛起  
**Sino-US Relations and Rise of Asia**

**授课教师**余博闻 副教授（[bowenyu@fudan.edu.cn](mailto:bowenyu@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东亚和中国的再次崛起 4](#_Toc211942367)

[一、东亚从领先到衰落 4](#_Toc211942368)

[（一）亚洲领先的时代 4](#_Toc211942369)

[（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 4](#_Toc211942370)

[（三）大分流 4](#_Toc211942371)

[二、理解东亚奇迹 5](#_Toc211942372)

[三、理解中国的崛起 5](#_Toc211942373)

[（一）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 5](#_Toc211942374)

[（二）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 5](#_Toc211942375)

[四、当今中美权力对比 5](#_Toc211942376)

[第二讲 中美关系的历史演进 6](#_Toc211942377)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美互动 6](#_Toc211942378)

[（一）早期中美互动 6](#_Toc211942379)

[（二）转向帝国主义 6](#_Toc211942380)

[（三）民国时期 6](#_Toc211942381)

[（四）美国在中国走向失败 7](#_Toc211942382)

[二、中苏同盟与中美冷战 7](#_Toc211942383)

[（一）中美冷战的形成 7](#_Toc211942384)

[（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7](#_Toc211942385)

[（三）台湾问题的起源 8](#_Toc211942386)

[（四）在印度支那的较量 8](#_Toc211942387)

[（五）中美大使级会谈 9](#_Toc211942388)

[三、中苏分裂与中美接触 9](#_Toc211942389)

[（一）中苏走向分裂与中美两面威胁 9](#_Toc211942390)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缓慢调整 9](#_Toc211942391)

[四、尼克松访华 9](#_Toc211942392)

[（一）反思、信号、回应 10](#_Toc211942393)

[（二）基辛格访华 10](#_Toc211942394)

[（三）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 10](#_Toc211942395)

[五、在曲折中走向正常化 11](#_Toc211942396)

[（一）停滞：从尼克松到福特 11](#_Toc211942397)

[（二）卡特政府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1](#_Toc211942398)

[（三）《与台湾关系法》 12](#_Toc211942399)

[六、建交之初 12](#_Toc211942400)

[（一）建交初期的大事 12](#_Toc211942401)

[（二）《八·一七公报》 13](#_Toc211942402)

[（三）挑战与摩擦 13](#_Toc211942403)

[（四）强化合作 13](#_Toc211942404)

[七、大危机及其化解 13](#_Toc211942405)

[（一）“六四”事件与美国施压 13](#_Toc211942406)

[（二）克林顿的冲击 14](#_Toc211942407)

[（三）第三次台海危机 14](#_Toc211942408)

[（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14](#_Toc211942409)

[八、战略调整时期 15](#_Toc211942410)

[（一）撞机事件 15](#_Toc211942411)

[（二）9·11事件与中美合作加强 15](#_Toc211942412)

[（三）小布什时期的台湾问题 15](#_Toc211942413)

[九、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 15](#_Toc211942414)

[（一）中美关系再定位 15](#_Toc211942415)

[（二）重返亚太与强化竞争 15](#_Toc211942416)

[（三）中美深入合作 16](#_Toc211942417)

[十、特朗普与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 16](#_Toc211942418)

[第三讲 中美战略互动的宏观分析 16](#_Toc211942419)

[一、体系压力与中美关系 16](#_Toc211942420)

[（一）均势、大三角与中美关系 16](#_Toc211942421)

[（二）权力转移和大国政治的悲剧 17](#_Toc211942422)

[（三）对体系结构的认知 17](#_Toc211942423)

[（四）中美战略竞争 17](#_Toc211942424)

[（五）霸权护持与美国在东亚 18](#_Toc211942425)

[（六）对结构现实主义路径的反思 19](#_Toc211942426)

[二、制度、相互依赖与中美关系 19](#_Toc211942427)

[（一）“复合相互依赖”与中美关系 19](#_Toc211942428)

[（二）国际制度与中美合作 20](#_Toc211942429)

[（三）对自由主义路径的反思 20](#_Toc211942430)

[（四）制度非中性与制度竞争 20](#_Toc211942431)

[三、中美关系的社会建构 20](#_Toc211942432)

[（一）机械的文化理论 20](#_Toc211942433)

[（二）互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20](#_Toc211942434)

[（三）对社会建构论的反思 20](#_Toc211942435)

[第四讲 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 21](#_Toc211942436)

[一、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 21](#_Toc211942437)

[（一）中美意识形态矛盾 21](#_Toc211942438)

[（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21](#_Toc211942439)

[（三）中美关系的起伏与意识形态因素 22](#_Toc211942440)

[二、美国行政当局与中美关系 23](#_Toc211942441)

[（一）美国总统的重要作用 23](#_Toc211942442)

[（二）总统周围的人 23](#_Toc211942443)

[三、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23](#_Toc211942444)

[（一）国会与总统 23](#_Toc211942445)

[（二）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干预 23](#_Toc211942446)

[四、美国国内的其他力量与中美关系 24](#_Toc211942447)

[（一）利益集团 24](#_Toc211942448)

[（二）智库 24](#_Toc211942449)

[（三）媒体 24](#_Toc211942450)

[（四）公众舆论 24](#_Toc211942451)

第一讲 东亚和中国的再次崛起

2025.9.16

一、东亚从领先到衰落

（一）亚洲领先的时代

据《世界经济千年史》，自公元0年到1820年左右，中国的GDP领先于欧洲；至1820年，中国的GDP已占全球的32.9%。作为古代GDP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人口这一项指标上，亚洲更是始终大幅领先欧洲。可见，在相当长的古代时期，亚洲在物质上是领先于欧洲的。

（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

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可被概括为中国中心与中国例外的体系。中国中心方面，中华文明的内核相对稳定，如文字系统、民俗传说、官僚体制等。中国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部分）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外族的征服者往往与中华文化融合。

“中国例外”方面，中国在最鼎盛的时期，也缺少与其他域外国家（如欧洲）的深度交流，这主要是客观因素（如地理）导致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核心是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心，是文明的化身，其他区域都是文化辐射多少的区别；在中国，“例外论”体现为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关于“中国是否一贯是和平主义国家”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是围绕边疆稳定展开的，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对外用兵有很强的扩张主义倾向，如秦皇、汉武；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古代战略“因势而为”，在处于战略优势时推行朝贡，在处于战略平衡时选择征战，在处于战略劣势时甚至会主动“纳贡”。

我们现在所说的“朝贡”，发轫于西汉，兴盛于唐代，但最典型的是明清时期。在世界剧变的17世纪，东亚的朝贡体系保持着相对稳定。有观点认为，朝贡可被扩展解释为“华夷之辨”的“天下主义”，体现出“文明-野蛮”的动态取向：谁是文明程度高、接受中原礼教秩序的稳定的政权，谁就是“华”；反之，就是“夷”。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族主义直到晚清才逐步建立起来。

朝贡体系是一种政治的体系，它是一种仪式与合法性的体系；朝贡体系也是经济的体系，如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环流，直到西方白银流入才被打破。

（三）大分流

中国的发展大约在明朝时戛然而止——人口增加了，但人均GDP没有增加。当15世纪中国的人均GDP处于低迷状态时，西欧的生产率却在缓慢而平稳地上升。工业革命又使这个差距大幅扩大。

较新的研究表明，从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在较高水平上波动，清代则呈下降趋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北宋中国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到1300年左右已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1750年之前，虽然中国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已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前已经开始。

近代以来，大分流演变为了大灾难。欧美列强之后，企图颠覆东亚秩序的日本接踵而至。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有诸多不同之处，如国际环境、改革阻力、群众基础、领导力量等，因而摆脱了中国的命运。

为什么会有大分流呢？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答案：

* **宗教精神论（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宗教比东方宗教更为积极，更加关注对自然的改造,特别是通过宗教改革后西方基督教中的新教教义鼓励人不断探索创新，积极创造物质财富，同时勤俭节约。
* **制度决定论：（道格拉斯·诺斯）**清晰的产权制度、规范的法律体系以及组织给结构的变革和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
* **宽容的文化和开放的观念（加州学派）**
* **政治分裂的影响（保罗·肯尼迪、沃勒斯坦，修正后的加州学派）：**欧洲是动态、流动、激烈的诸强竞争结构，亚洲则是稳定、僵化、平和的帝国-附庸体系。正是欧洲的分裂和竞争促进了欧洲的崛起。

二、理解东亚奇迹

20世纪60年代，亚洲的时代归来了——包括GDP、消费额、年贸易额、平均预期寿命、识字率、贫困率在内的一系列指标明显改善。

有诸多理论解释东亚奇迹：亚洲价值观论，如亚洲人更具备“勤劳”的特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积极融入世界市场论，常被用于解释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宏观经济环境论，如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为工业化与经济腾飞奠定基础；生产要素投入论；等等。

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要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经济官僚机构，进行政商合作，推行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三、理解中国的崛起

（一）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

毛泽东时代是现代中国所有经济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自主的工业体系，在不依靠殖民侵略的情况下为之后的改革打下了物质基础。人口数量、平均寿命、素质均有了相当的提升，发挥了人口资源的红利作用。

在中央计划与地方创造性的结合之下，改革开放以渐进的形式展开。

（二）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

中国是一个发展型国家吗？从定义上看，中国政府确实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经济官僚机构，并推行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但是，中国具有深度耦合的政商合作吗？这一点是不确定的。

四、当今中美权力对比

我们回顾汉斯·摩根索的权力观，以下维度用于以物质力量衡量权力：地理条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人口、民族性、国家士气、外交质量、政府质量。

201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评估国家的权力时，不能仅从GDP、国防开支等宏观数据看，而要从“控制力”的具体角度看。以军事维度为例，即相关的武器装备对海洋、高空、外太空、基础设施的控制力；这样看来，当时美国的军事控制力是绝对的，其次是俄罗斯，再次才是中国。

阎学通、徐进在2008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计算软权力的方法，其维度包括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对国内社会上下层的动员力等。以这样的标准计算，美国的软权力大于中国。

第二讲 中美关系的历史演进

2025.9.23 / 2025.9.28 / 2025.9.30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美互动

（一）早期中美互动

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来到了中国广州，次年回到纽约，这是有记载的中美首次互动。早期中美互动的主要特点是以贸易、宗教和文化交流为主要形式，较为平等，没有治外法权；当然，由于清朝不承认美国大使的外交身份，所以这种平等并非外交意义上的平等关系。贸易方面，中国出口丝绸、茶叶、土布，进口基础制品、毛皮、棉花，形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宗教方面，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从事出版、翻译、医疗等业务。

（二）转向帝国主义

鸦片战争（1840~1842）后，美国追随英国，要求“利益均沾”，胁迫清廷签订《望厦条约》（1844）。美国一直充当英法侵华帮凶，也充当清廷的支持者。美国在中国的行动中，较为特殊的是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他推行列强“合作政策”，主张降低武力使用频度，通过外交施压推行不平等政策；他调停中英关系，翻译万国公法，获得了清廷的信任，于是代表清廷出使欧美（1868），越权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

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导致中国历史上首次抵制美货（1905）。1899年至1900年，美国正式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形成均等的贸易机会，使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向美国开放。上述过程，正是美国逐渐转向帝国主义的过程；虽然与欧洲列强的武力扩张、划分势力范围不同，但美国同样是通过国力实现了帝国主义扩张。

（三）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中，美国进行了干预，支持袁世凯，如参与了“善后大借款”；虽然在舆论上对孙中山保持支持态度，但实质上不支持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一战时期，美国对日妥协，在1917年与日本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一战后，威尔逊主义给了中国以虚幻的希望，但威尔逊声称“十四点原则”可能不适用于中国，且他判断使日本在国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要比维护中国权益更重要，再加上当时美日合作入侵苏俄，所以威尔逊主义最终在中国破产。1922年，华盛顿会议恢复了东亚均势，美国此后也开始在中国寻找代理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彼时的美国孤立主义横行，因此没有采取实质的干预。当时的美国对此提出了“史汀生主义”：美国政府不能认可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

二战前期，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取决于美日关系的发展。在全面抗战初期，美国在孤立、绥靖和援华制日两面不断摇摆。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以《检疫隔离演说》对国内进行试探，但无果而终。1941年《租借法案》通过后，美国开始以援华为主。最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终于转向全面支持中国，并支持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美蒋特殊关系就是在二战期间建立的，并从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演变为了战后的“扶蒋反共”，其主要动机是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短期目的是打败日本，长期目的是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从而对苏联形成抵制。当然，美蒋合作在早期也遭遇了挫折，如史迪威事件。

1943年，中国废除了美国的治外法权，美国也废除了《排华法案》。同年，中国还参与了《开罗宣言》的发表。

（四）美国在中国走向失败

日本投降后，美国保持对蒋支持。但出于自身干预倾向的降低，以及对苏联干预的警惕，美国选择首先反对中国内战，积极调停，但调停失败。1948年，美国通过《援华法》。最终，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与新中国建立后“一边倒”的政策，标志着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二、中苏同盟与中美冷战

（一）中美冷战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判断是，这是苏联扩张的新模式，苏联的真正目标是要征服美国的东亚盟友，尤其是日本。与此同时，美国基于自身实力，忽视了中国的信号；但是，中国具有很强的参战的动机，即地缘政治的考虑，以及打压国内的反动力量。

（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美国在1953年的NSC166、NSC166/1中提出了远东的冷战战略：

一个强大的、有严密纪律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剧烈地改变了远东的权力结构，大大扩展了苏联的影响，而缩小了美国的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付这种由于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及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结盟所引起的权力结构的变化。

虽然美国希望中共政权改变政策取向，或最终被一个不敌视美国的政权所取代，但试图用美国的武装力量或用台湾国民党人的力量达到这一目的都是不可取的，因此美国当前的政策应当是“用除了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相对强国的地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削弱或中共力量或滞阻其发展；破坏中苏关系。

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战略具体到亚洲，就是遏制中国，具体措施包括：

* 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 禁运
* 阻挠西藏和平解放
* 支持台湾的国民党
* 建构半月形防线（台湾地区、东南亚、韩国、日本）

（三）台湾问题的起源

一旦发生战争，台湾是一个部队集结地区，空军战略行动基地，控制日本与南方海上交通线的海军基地……

——美国政策文件中的对台定位

美国对台政策最初举棋不定。在1950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逐渐从杜鲁门1月5日声明倒退，向重新介入中国内战倒退。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为美国决策者拿定主意提供了契机——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之所以干涉，目的之一是为了“中立化台湾”。

1954年至1955年，爆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大陆出于国内的考虑，炮击金门，台海交战。1954年12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5年1月至2月，解放军攻克一江山岛和大陈岛。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于7月13日代表中国政府回文表示同意；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举行。至此，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解除。在这次台海危机后，蒋介石当局意识到当前的局势可能造成“两个中国”。

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使蒋介石当局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来临，开始在金门大规模驻军，并向大陆投放传单。1958年8月23日至10月31日，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大陆方面基于支持同一时期美国在黎巴嫩的干涉行为，“炮击金门，意在击美”。解放军谨慎部署，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大陆还把金门、妈祖等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以此反对美国使台湾与大陆分离永久化的企图。第二次台海危机使得美台矛盾进一步激化，大陆和台湾相互配合，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

（四）在印度支那的较量

NSC68号文件（1950）第一次以后来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逻辑来阐述印支的战略重要性，指出：

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进一步扩张对美国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而印度支那是东南亚的关键地区，且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主导的政府所控制，那么相邻的泰国和缅甸也将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中。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将遇到严重危险。

——NSC58

日内瓦会议（1954）导致美国加紧扶植越南的反共政权（吴庭艳）；推动建构《东南亚集体防备条约》，成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导火索之一。1960年代，美国军事干涉越南，中国援越抗美。

（五）中美大使级会谈

自1955年起，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正式举行大使级会谈。至1970年2月，双方共举行了136次会谈。1955年至1960年中美局势紧张的五年间，两国之间的会谈有103次。1955年9月双方就平民问题达成协议，规定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但双方在禁运问题和台湾问题上毫无进展。

三、中苏分裂与中美接触

（一）中苏走向分裂与中美两面威胁

中苏关系受意识形态与战略的双重影响，走向分裂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这些事件包括：苏联对支持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的犹豫，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事件（1958），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影响（1958），苏联对美缓和与中国对美斗争，中苏论战与撤回专家（1959），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新疆边民越境（1962），古巴导弹危机后中苏再次论战（1962~1963），美苏签署核禁试条约（1963）等。

从不支持、不合作到反对，从意识形态分歧到直接论战，这些矛盾的激化构成了中苏分裂的链条。在1963年时，中苏关系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1963年，苏军进驻外蒙古；1966年，苏军增兵蒙古；自1963年至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4189起纠纷；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更让中国把苏联作为了主要防范对象。与此同时，美国也发起了军事威胁：1964年东京湾事件后，中国开始备战；中国反对越美和谈，援越抗美。

面对美苏两方面的威胁，中国准备通过人民战争“两面打”。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缓慢调整

1959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任威廉·富布莱特主持下，美国康仑公司发布了《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研究报告，系统性地检讨了美国对东亚的政策，给出了缓和对华关系的思路。这篇报告并未获得美国大众的青睐，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内舆论反对对华缓和。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产生了对中苏分裂的初步认识，认为中苏分裂“比较有限”；美国还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好战；针对中国的核试验，肯尼迪政府集中精力予以应对，但由于情报的错误而未能预测到中国成功核试验的时间，美国最终也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又处于“苏攻美守”的困境之中，这成为了美国调整外交的重要动机。

四、尼克松访华

（一）反思、信号、回应

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是中国有所准备的对一段时间以来苏联频繁进行边境挑衅的战术反应。以此为契机，中美开始了更密切的接触。

4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提出“美帝苏修共同反华”。会后，毛泽东委派四位元帅分析国际战略，周总理对此进行总结，得出结论：只谈美苏勾结，不谈美苏争夺，是片面的。自此，中国对美战略出现松动，中美在外交场上开始逐步试探。

尼克松就任后，在国安委会议上提出苏联是比中国更具威胁的一方，苏联若要摧毁中国，那么是对美无益的。中国随后释放了一批美籍间谍人员。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10月，尼克松在会晤齐奥塞斯库时，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1971年2月，尼克松提出要与北京方面对话。3月，“乒乓外交”发生。

（二）基辛格访华

1971年7月9~11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为实现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对中国进行的秘密访问，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称之为“波罗行动”，意指此行像700年前马可·波罗造访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

1970年10月，尼克松请即将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准备改善两国的关系。通过巴基斯坦政府的居间斡旋，中美就基辛格访华达成一致。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飞抵北京。

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基辛格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随后，双方发表了会谈公报，宣布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

（三）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

联合公报在阐明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各自看法和立场、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后，强调指出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还认为，大国相互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在《联合公报》中重中：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区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方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联合公报》还规定，双方将为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并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五、在曲折中走向正常化

（一）停滞：从尼克松到福特

尼克松与福特任期内，中美人员与贸易交流频繁。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来华访问，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在此期间提出了“一条线”战略。5月，中美互设联络处。

1973年至1976年，中美正常化的实质进展迟缓。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总是“脚踩两只船”，不肯丢弃“老朋友”；美国在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而且美国政策的重心常常在两者之间摇摆。“水门事件”后，福特政府在国会面前呈“虚弱”的状态，国内保守派对其施加了较大的压力；1974年基辛格访华时，其立场就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如要在台湾设立“办事处”。与此同时，中国的对美缓和力量也受到了较大的打压，在基辛格后续几次访华时，周恩来受“文革”影响，已很少发表意见。

（二）卡特政府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政府初期在对华政策上举棋不定，国务卿万斯支持对苏缓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支持以中国制衡苏联。1978年，美苏缓和没有进展，美苏关系恶化；同年，中苏、中越关系恶化；5月20日，布热津斯基访华。1979年至1980年，由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大局扩张，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说，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政府的声明说：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本政府将寻求调整我们的法律和规章，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新情况下得以（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还表示，应美国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三）《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4月10日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

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

——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该法第三条又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总统和国会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台湾防御需要做出的这类决定，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为了向总统和国会提出建议所做出的估计；

——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

第四条“法律的适用或国际协定”中规定：

不存在外交关系或承认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意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六、建交之初

（一）建交初期的大事

建交之初，中美贸易额快速增长。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应卡特总统的邀请，于1979年1月28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1980年，中美两国贸易协定通过，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中美还加强了军事合作。1980年1月5日至13日，布朗率代表团访华。这是美国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布朗访华后不久，4月，美国商务部把对中国的出口控制从“Y”类（对华沙条约国集团）放宽到“P”类（对新国家集团），这样，包括运输机、远程通讯设备、军用直升飞机等就都可以向中国出口了。

耿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访美以后，五角大楼正式宣布，决定向中国出售战术性防空雷达、运输用直升机、试验喷气机引擎用的压力功能转换器、大型拖车、早期预警雷达天线、雷达干扰装置、对流层通讯器材、战术无线电装备运输机等九项军事装备。

中美教育交流快速发展。1979年中国向美国派出1330名学生和访问学者，1980年派出4324名，1983年派出19000名。

（二）《八·一七公报》

1980年11月，里根在大选中获胜。里根在竞选中曾发表了许多有损中美关系的言论。里根上台之后，因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发生外交冲突。中美遂进行谈判，并于1982年8月17日发布公报，其核心的内容是第六条：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八·一七公报》

在这里，美国政府做出了三项承诺：即“不超过”“逐步减少”“最后的解决”。虽然美国没有同意设定一个终止武器售台的最后期限，但这三项承诺毕竟也是重要的进展，也是对美台关系的一个约束。

（三）挑战与摩擦

1980年，中美签订了第一个纺织品贸易协定，有效期为2年。1982年至1983年，中美关于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的谈判遭遇挫折，可谓中美首次贸易摩擦；不过在经过谈判后，中美还是签订了新的协议。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湖广铁路债券案、胡娜事件等政治事件，引发外交风波。

（四）强化合作

1984年，赵紫阳访美，里根访华。中美高层互访从此愈发频繁：1985年7月，李先念国家主席访美；10月，布什副总统访华；1987年3月，舒尔茨国务卿访华；5月，杨尚昆军委副主席访华；1989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中美还进行了军事交流，如军方高层互访、技术合作等。

七、大危机及其化解

（一）“六四”事件与美国施压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老布什政府认为不能对中国过度施压，但国会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于是，美国开始对华制裁——暂停军售、暂停军事领导人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等。美国的施压也带动了一众盟友的对华施压。但是，老布什依然顶住了国会要求全面经济制裁的压力；6月8日，老布什试图与中国领导人对话，但未能成功；7月1日，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开启了老布什与邓小平的对话进程。

在这一事件中，老布什总统扮演了稳定局势、推进接触的角色，美国国会则扮演了施压的角色，如南希·佩洛西提出的《1989年紧急放宽中国移民法案》《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等。自1990年至1992年，美国总统与国会也就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老布什始终反对制裁法律化。

1990年12月，世界银行年会讨论是否恢复对华贷款，美国投出弃权票，宣告着美国这一阶段对华施压的基本结束。

（二）克林顿的冲击

自克林顿政府起，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开始确立为防止出现一个新的如苏联那样和美国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军事力量，并能与美国在同一层次上较量的“同辈竞争者（peer-competitor）”。美国认为，中国不仅是最具有潜力成为这样的战略竞争者，而且与西方或东方同样具有潜力的竞争者相比，中国是最具有挑战的国家。

当然，虽然克林顿政府意识到了中国的潜力，但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背景下，美国也未有太过重视，认为中国很可能在不久的时间内“发生大变化”；克林顿也指出中国将走东欧与苏联的老路，并认为美国应该促进这一过程。由此，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参与和拓展”战略：使中国参与世界市场，并在中国拓展“民主”——也就是和平演变。面对克林顿的冲击，中国展现出了战略定力，江泽民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

1993年7月至9月间，中美发生了一场外交冲突，即银河号事件：美方声称有证据证明中方通过银河号向伊朗输送化学武器原料，要求登船检查；中国拒绝在国际海域接受美方登船。最终，双方达成妥协，银河号在沙特阿拉伯停靠，美方人员以沙特阿拉伯名义登船检查，最终发现没有化学武器原料。之后，中方要求美方赔偿、道歉，但美方均未回应。

1993年4月，美国国会再提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大量企业则要求无条件延长。克林顿考虑到经济问题，选择了无条件延长。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挂钩，但再次遭到企业界反对，克林顿只好继续无条件延长。

1993年，江泽民和克林顿在西雅图参加APEC峰会时会晤，江泽民邀请克林顿访华，此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中美关系。

（三）第三次台海危机

海峡两岸关系自19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以经济交流为重，本已日趋缓和。1990年代初因东欧、苏联剧变的情势，以及“六四”事件造成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不再需要拉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苏联，双方政治关系日趋紧张。

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并在演讲中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词汇，正是这一行为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1995年7月下旬，中国试射导弹；8月15~25日，举行导弹火炮演习。美国多次表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

1996年3月，为反对“台独”势力，中国再次在东海和台湾海峡举行导弹发射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和南京军区分别向台湾外海发射导弹，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美国则紧急调动两个航舰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海峡一时战云密布。

最终李登辉当选连任；美国特使访华，重中美国的几个“不支持”。

（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1996年，在中国经济一片大好的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对过去三年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检讨，提出“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新共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稳定了东亚金融局势，美国意识到了中国作为合作者的重要性，双方贸易来往转好，军事合作恢复。1997年与1998年，双方领导人互访。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2000年，美国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

八、战略调整时期

（一）撞机事件

2001年4月1日，美国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Ⅱ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被中国确认牺牲。而美国军机则未经允许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

中国指责美国侦察机故意撞向歼-8战斗机，并且在没有通知和许可的情况下降落于中国领土；而美国则说，EP-3是被失控的歼-8战斗机所撞击，并且被中国的另一架歼-8带到飞机场。

中美双方就事件责任偃持不下，更演变成为了一场外交危机。经过政治角力，事件最终以美国发表一段含糊其辞的“道歉”（very sorry)，中国释放人员、交还飞机告终。

（二）9·11事件与中美合作加强

“9·11”事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机——在此之前，小布什政府尚未决定好对华战略就遭遇了撞机事件；“9·11”发生后，中国快速反应，发去慰问，并提供了一定的情报支持。

在“9·11”事件后，两国元首开始频繁互访。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要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人的利益攸关方；同年，中美战略对话建立。2006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建立。中美在经贸、金融、反恐、安全（朝核）等领域的合作得到了强化。

（三）小布什时期的台湾问题

中美撞机事件后，小布什表示“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2001年4月，布什政府宣布了售台武器大单：四艘基德级驱逐舰、八艘柴油动力潜艇。2002年，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宣称要在第二任期“修宪”。小布什政府公开批评陈水扁，“反对”法理“台独”，缓和了台海局势。

九、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

（一）中美关系再定位

奥巴马上台后，提出注重中美关系的“巧实力”。奥巴马政府还提出“两国论”（G2），但中方认为这代表了两个大国搞霸权主义，因而不予响应。中国相应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达成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是有所排斥的。

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建立。

（二）重返亚太与强化竞争

2008年奥运会与2010年世博会后，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抗衡中国崛起。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由安全布局和经贸安排的“双翼”组成，即首先是在安全领域拓展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其次则是在经济领域力推由美国主导、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三）中美深入合作

美国发展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和大幅度增加对华贸易和投资。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超过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全年人员来往超过400万人次。中美加强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与中国的高频率互动。

美国不断增强中美合作，从原先的反恐、核不扩散等问题扩展到外太空和海洋权益等领域。特别是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领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还达成了《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双方通过共同努力把难点变成亮点。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保持了频繁接触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多个稳定中美交流机制。

十、特朗普与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美转向全面对抗，特朗普政府以“全政府”方式加大对华压制。拜登政府虽然与特朗普政府属不同政党，但对华态度相似，对华战略有延续性，仅在一些议题上有所差异。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可被概括为“弹性‘遏制’”，其重拾“人权”等意识形态价值观，更强调与盟友的关系，以制度的形式避免单独面对中国。

拜登时期，美国挑起的麻烦不断，如佩洛西窜访台湾、气球事件、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制裁威胁、台海紧张等。中国发挥“底线思维”，提出“四不一无意”，但这一表态也迟迟没有落实。

第三讲 中美战略互动的宏观分析

2025.10.14

一、体系压力与中美关系

（一）均势、大三角与中美关系

我们知道，均势是使国际权力配置大致相等，以防止任何国家强大到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均势或“权力平衡”中的“权力”（power）不仅仅指物质意义上的“实力”（strength / capacity），也指关系维度上的“影响力”（influence）——可能来自外交和文化。

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中美苏三国互动以保持国际战略平衡的历史。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指的是在一个由三个国家构成的系统中，其中一个国家的行为会对另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或其中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另一对或两对双边关系发生变化的互动关系。

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1981年发表的论文《战略三角：博弈理论初析》，对三角关系的形态作出了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他提出了三角关系的三种形式：

* **“三人共处”式：**由三方间的对称和睦关系组成。
* **“浪漫三角”式：**由处于“主轴”的一方与处于“两翼”的两方建立和睦关系，而后两者则是敌对关系。
* **“稳定婚姻”式：**两方之间建立了和睦关系，而都同第三方处于敌对关系。

从三角关系的互动来说，三角关系的各方都总是力争在三角结构中处于有利地位，其中的主要模式有：

* **A国与B国发展关系是为了促进与C国的关系：**例如，70年代美国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促使苏联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的缓和，特别是1971年7月中美两国宣布尼克松将访问中国，引起苏联的极大不安，促使苏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 **A国与B国发展关系是为了制约C国：**例如，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下，美国加快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由在中苏之间搞“机械的一碗水端平”的平衡政策变为偏向中国；卡特总统下决心把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问题同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并开始同中国发展军事关系。中国的“一条线”战略也属于这一模式。

总之，在中美苏三角中，美苏是超级大国，中国则是较弱的一角；但是，由于美苏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国就作为了矛盾的焦点，成为了美苏平衡的破坏者。中国在大三角中成功获益，其主要手段是同一极联手，而非“三足鼎立”。

（二）权力转移和大国政治的悲剧

我可能已经说了130遍了，中国无法和平崛起。

——约翰·米尔斯海默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国家是安全稀缺且只能自助的，因此只能追求安全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无法彼此信任，因此为了自保，就只能争夺生存霸权，就产生了进攻性取向，必然导致国际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与之类似的概念，如“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困境”都表达了中美冲突的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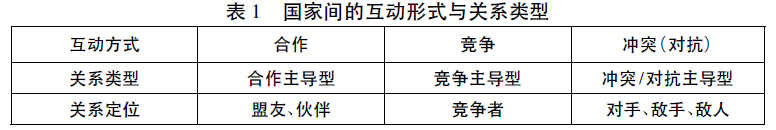
（三）对体系结构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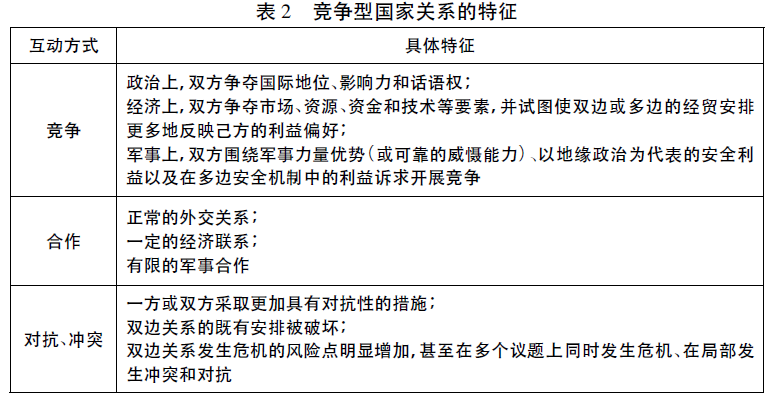
有学者认为，尽管美国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其信心流失的速度和程度超过了实力下降的幅度。在绝对实力出现衰落和信心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对地区权力转移的进程更加敏感，对丧失主导地位的担忧愈发显著。因此，它倾向于利用已有的安全矛盾来加强对中国的牵制。

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忧虑找到了契合点，个别国家制衡中国的意愿也在加强，这些美国的盟友、准盟友和安全伙伴与中国打交道时，或多或少在寻求美国的支持，迎合美国防范中国的战略需求。

（四）中美战略竞争

吴心伯指出，中美战略竞争是体系压力的结果，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果。





有学者也提出了“拒优战略”。拒优战略可以理解为在两国都有可能最终获得全球或地区主导权的情况下，以不发生战争为底线，基于阻止对手获取竞争优势，采取自我权力增强、制度构建等一系列手段去分化和削弱对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主导权或至少拥有对对手主导权的大部分否决权。拒优战略的特点有：

* **强烈的预期主导性：**战略主体对未来的主导权有所预期，并认为自己与竞争对手均有机会获取主导权，这也导致双方很难和解。
* **显著的战略针对性：**由于双方都谋求主导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竞争，这使得拒优战略的主体在核心竞争领域更为关注相对收益，都谋求抵消对方优势，担忧对方的累积优势。
* **以不合作为占优策略：**拒优战略的主体不仅认为自己有机会获得最终的主导权，还认为合作有利于竞争对手增强优势，因而以“不合作”为占优策略。
* **战略手段具有复合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强自我权力，借此来谋求优势地位，抵消竞争对手的权力增强；二是诉诸优势塑造，通过制度构建促进自身权势转化的同时阻遏对手权势的转化；三是加强国际影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更多国际支持，分化削弱对手的国际支持和地区认同。

（五）霸权护持与美国在东亚

霸权利益视角认为，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包括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两个方面。霸权实力地位是霸权国最重要的整体国家利益，意味着在对外政策中维持和扩大与对手的实力差距是一个根本的战略原则。如果霸权国可以保持和其他大国或者国家集团的实力差距，它的国家安全、经济财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维护。霸权制度地位是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工具之一，可以增强霸权国的实力、影响力，有效地促进霸权国的其他国家利益。

美国支持乃至促进某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条件是：

1. 美国和该地区的大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2. 该地区的主要大国支持美国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反对乃至阻碍某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条件是：

1. 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显著地减少了该地区和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差距；
2. 该地区的主要大国试图挑战美国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在任意一种条件下，一体化进程都会使该地区成为霸权国在国际事务中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

（六）对结构现实主义路径的反思

以结构现实主义解释中美关系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

1. 大三角理论主要适用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但在冷战后是否仍然适用还需要商榷——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中美暂时没有构成美苏那样的两极态势，世界上暂时也还没出现足以称作“第三角”的国家或势力。
2.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施动者层次（如观念、领导人、互动、国内政治等），只能分析大趋势，几乎不讨论变化的过程，往往无法解释两国关系演变的时机。
3. 结构现实主义可能过分关注消极证据，忽视了相互依赖、制度、互动等因素和机制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
4. 可能会支持“新冷战”“宿命论”等论调。

二、制度、相互依赖与中美关系

（一）“复合相互依赖”与中美关系

约瑟夫·奈和基欧汉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奈和基欧汉的理论创新是基于对新现实主义主要假设的修正）。复合相互依赖与简单的相互依赖不同，我们在此回顾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作的这些修正：

* **假设1**
  + **现实主义：**作为整体的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国家中心论）；
  + **基欧汉&奈：**①国家不是主导行为体，国际行为体还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个人等；②国家间的交往有多层次、多渠道。
* **假设2**
  + **现实主义：**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军事安全最重要，为高政治问题；经济和社会事务次要，为低政治问题；
  + **基欧汉&奈：**许多问题与军事安全问题并列，他们之间没有固定明确的等级之分。
* **假设3**
  + **现实主义：**武力是一种可用且有效的政策工具；
  + **基欧汉&奈：**军事力量在许多问题上影响力有限。

经济关系被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客现看待彼此的发展阶段，尊重彼此的发展利益，把对方的机遇和挑战视为自己的机遇和挑战，寻找更多利益契合点，创造更多合作新亮点，实现良性互动。

——习近平

也有观点认为，人文交流、多议题合作也是“压舱石”。

（二）国际制度与中美合作

我们知道，国际制度为国家间合作提供信息，提供谈判平台，减少遵约行为的交易成本，增加违约行为的交易成本。中国自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制度以来，遵约记录良好。奥巴马时期，两国建立六大类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三）对自由主义路径的反思

对自由主义路径的反思包括：

1. 可能过分强调积极的一面，制度层次上也有竞争和冲突，相互依赖也可能成为冲突之源。
2. 无法解释奥巴马后期和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恶化。
3. 制度和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会受到结构性因素和其他层次因素的抑制和破坏，需要进一步讨论变化的机制问题。

（四）制度非中性与制度竞争

既然制度或许不是中美合作的变量，那制度是否又是中美竞争的焦点呢？有学者提出了崛起国的“改制意愿”，并举了中国所创设和参与的国际制度作为抗衡美国主导制度的案例以证明。

三、中美关系的社会建构

（一）机械的文化理论

文明冲突论、意识形态冲突论作为机械的文化理论，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

（二）互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积极互动与中美互信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如“外交小步舞”与中美的缓和。中国不断自我强调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建设者，而并非颠覆者（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对中美关系性质做出的权威解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定性侧面反映了中美两国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但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与美国建立以合作为主导的良性关系的希望。中国接受国际规范、实行灵活克制的对美政策。

中美是否经历着消极互动与身份再造？一种观点认为，2010年之后尤其是中国新任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外交出现了明显转型由此前的“韬光养晦”越来越转向“奋发有为”。中国不仅在维护周边领海安全等议题上，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各类议题上，都比此前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甚至在某些国际领域已经在积极构建新的机制与规则。中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强国宣传。

（三）对社会建构论的反思

有学者提出了对社会建构论的反思，总结在下方。

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政策界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到美国压制，是因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中国不能成功地令美国相信自己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因彼此“战略互疑”而相互猜忌与冲突，因此两国应当更好地通过沟通和对话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动机，据此建立战略互信，构建建设性的大国关系。在上述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反复向美国明示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无意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领导者地位，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也经常因忌惮美国的战略猜疑而高度克制。然而，这些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未能消除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威胁认知。中美关系发展的瓶颈之所以无法通过增进战略互信来突破，是因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症结主要不是因为误判了对方动机，而是由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致。

美国的回应并非是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而是根据中美两国客观实力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潜在能力进行预防性打压，中国却把重点放在向美国证明自己在主观动机上无意挑战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尝试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和对美让步的做法没能转变美国制华政策的大方向。中国必然会承受来自美国及其体系的压力。无论中国试图与美国构建怎样的大国关系模式，这一实质都不会改变。

第四讲 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

2025.10.21

一、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

（一）中美意识形态矛盾

广义的“意识形态”定义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模式的理想描述与实现形式。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道路之争，这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国家与市场问题，以及人权-宗教问题。西方中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嵌入在美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谱系之中的。实然层面的美国与名义上的“美式民主”是存在差别的，例如美国声称自己是“小政府”，但实际上联邦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

（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意识形态矛盾构成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制约。亨廷顿指出，政治价值观为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限度和参数。陶文钊指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阻碍了中美两国间深层次的互信和友好关系的建立。王缉思和李侃如指出，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是导致中美之间战略互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柯庆生对中美之间“相互尊重”的表述提出质疑，认为中美对于彼此“核心利益”的认知存在偏差。比如，中国认定的核心利益中包含政治体制、领土主权等，事实上与美国“推进政治自由化、维护盟国安全”等目标存在分歧。

意识形态扭曲了美国的中国观。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地按照西方的制度原则和社会结构来判断和衡量中国，按照美国人所认知的“常理”来认识中国问题。通过接触改变中国（曾经？）是美国的政策共识。中国无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但美国不相信中国的宣传，中国也提防美国的“和平演变”。

阎学通指出，意识形态影响也有一定条件性，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

* 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小；
* 中国的发展方向越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会越小；
* 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 中国的发展方向越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就越会被放大。

两个因素相比较而言，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

（三）中美关系的起伏与意识形态因素

1. 战略需要主导：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中，主动提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而是其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对于美国的政策”。中美双方于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也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上海公报》

2. 战略需要契合，预期协调：1980年代前、中期（最好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缓和进程的暂时受挫以及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扩张恶化了美苏关系。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推动了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美国总统里根在回访中国期间，在复旦大学发表了演讲，他特别提到，尽管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语言、价值观、文化和历史，政治制度也有根本区别，但是这些不应当妨碍两国之间的合作。

3. 战略需要下降，意识形态争执升温：1980年代后期

苏东剧变，战略需要骤降，意识形态矛盾占主导。1990年代，中美关系来到了历史最差。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自1990年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也从1990年起不遗余力地带头提出反华提策，但是均未通过。1995年的中美交锋最为激烈——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第51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的反华提案唯一一次进入实质性表决阶段，但最终中国以一票险胜。

在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中美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克林顿政府决定于1993~1994年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

4. 战略需求上升，重拾希望，意识形态矛盾降温：2000年代

克林领对华接触战略的目标之一是通过这种接触给予好处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试图有效地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让中国在继续改革开放；通过鼓励中国的经济开放实现中国政治向民主转型的目标。小布什时期中美反恐合作，同时希望以贸易改变中国。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战略需求仍在，但逐渐幻灭。特朗普时期以来，中美进入战略竞争，从幻灭到感到模式竞争压力。

二、美国行政当局与中美关系

（一）美国总统的重要作用

国家元首对中美两国关系发挥着战略引领作用。元首引领作用突出地体现在其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上。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一些问题，比如对于联合公报的文本斟酌——这涉及到中美两国如何向世界宣布双边关系的战略共识，对于台湾问题基本原则的协商等，双方的谈判都是在不受国内政治和其他因素影响之下进行的。

不同总统的政治权威、议程和战略理念不同，这些因素都影响中美关系进展。

（二）总统周围的人

总统周围有一些小集团或个人，同样发挥着影响力。例如，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与国务卿万斯就形成了对华政策的两派：布热津斯基仇视苏联，因此要求加速对华接触；万斯则主张对中对苏“一碗水端平”。当然，总统周围的人能发挥多大影响力，反过来还是要看总统——例如，特朗普就限制着其阁僚对其自身的影响力。

三、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一）国会与总统

建交之前，中美互动以秘密外交为主，美国行政当局占主导——“秘密外交”屏蔽了国内其他力量，尤其是美国国会的干扰。但是，此种机制是不可持续的，“秘密外交”也要考虑国会的反弹。

一般地说，美国国会和总统在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不断谋求把中国改变成为一个“政治多元、经济自由和社会开放”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这种目标。在国会，一些议员仍然倾向于对华（尤其在经济、人权领域）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和手段，并同情台独势力。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则更倾向于主张实施长期的对华接触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国会和总统之间的权力较量以及党派之争表现突出，尽管它们之间也有政策一致和达成跨党派共识的时候。

（二）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干预

国会干预外交的动机包括民意、议员自身的认知（意识形态）、利益集团施压、权力斗争、利益等。众议员多出身地方，相较参议员对国际事务了解较少，因此更容易因自身意识形态或外部压力而作出干预外交的决策。

国会干预外交的手段包括涉华法案、财政权（附加条件）、调查报告、听证、施压（参加活动、给行政当局写信）等。

国会干预中美关系的典型案例包括台湾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等。当然，在此过程中总统与国会也会发生矛盾，如90年代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国会委员会制度也有影响，从国会委员会递交到国会的法案，有很大概率被通过。

四、美国国内的其他力量与中美关系

（一）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政治行动委员会、提起司法诉讼、发起舆论攻势、直接行动等方式影响中美关系。

贸易利益集团（大公司）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贸易集团对华的经济利益格局是逐步变化的。对于贸易集团来说，鉴于贸易利益的性质以及可替代性，本质上并不在意中美关系是否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因而不会致力于谋求一个客观全面的对华政策，它们热衷的是立竿见影的利益。美国与跨国公司的东道国保持相对良好的国家关系，是跨国公司介入国会制定外交政策时所追求的首要目标。但是，跨国公司也可能乐见美国对华施压，坐享中国改变带来的红利。

此外还应注意台湾在美国的院外活动。1979年中美建交后，台湾与美国的官方关系在法理上消失，台美关系的正常途径大大受阻，这一形势使得以前的“第二管道”变成了首要选择，国会成为台湾当局对美政策的首要目标。

（二）智库

美国的智库分为保守派智库和自由派智库，两方的观点很不一致。有些智库与台湾的院外活动机构有密切联系。

（三）媒体

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体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主要是注重宣扬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宣扬美国的“天赋使命”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妖魔化”中国。

（四）公众舆论

舆论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至少为政府划定了非正式的行动范围。舆论对政府和官员就起着限制和监督的作用。舆论所体现的强有力民众支持是政治家的力量之源。舆论有助于政治家认识到公众最重要的关注，从而有助于他们成功地安排竞选。政府影响舆论乃至制造舆论使公众支持其政策。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矛盾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力量是多元的。相对而言，美国对华政策相对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中国的对美政策具有相对统一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中美关系是一对实力相差悬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迥异、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特殊关系，驾驭和操作有相当的难度。